



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容闳： 睁眼看世界的“草根”第一人

1912年4月21日，在中华民国元年的春天，容闳结束了坎坷曲折但死而无憾的一生。在他逝世一百年后，探询他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，仿佛从一个独特的切面，重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进化史。

耶鲁第一个中国留学生

1828年11月，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走“正途”，家里实在没钱再供容闳，只好送7岁的他去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。令人感叹的是，容闳上的教会学校，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片贩子、战争煽动者颠地和查顿募资兴建，1840年，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爆发一度辍学。这就是容闳成长环境的矛盾之处，老家村民既痛恨“红毛番”横行乡里，也感激他们带来的医疗、教育、慈善事业。容闳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心想孩子学会“番话”，和洋人做生意，说不定能发财。他抱的是“赌一把”的心态，绝不会料到儿子能开一代风气之先。

18岁那年，教会学校的布朗校长因身体原因要回美国，临行前他在班上说，想带走几名学生赴美深造，如果有愿意的就站起来。这时容闳站了起来。他想亲眼看看书本上那个精彩的新世界。

1850年，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，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。他是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，其画像至今悬挂在耶鲁校园中。近代史学者雷颐评价，如果说林则徐、魏源是近代中国“精英”阶层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先驱，那么容闳这个农家穷小子，就是第一个“睁眼看世界”的“草根”。

太平天国不是想象的理想国

1855年，容闳学成回国，回国初期，容闳在外国人驻华机构就职，结果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，不到一年时间跳了三次槽，皆因不能忍受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，即使他是耶鲁高材生也不能例外。在香港，容闳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。农民家庭出身使容闳对洪氏起义抱有天然的同情和支持，他甚至曾经想要投奔太平天国。1860年11月，容闳欣然前往“天京”，与洪仁玕一见面，就提出了七条建议，主要是针对教育：设立武备学校，海军学校，实业学校，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，以《圣经》列为主课等。这些建议与洪仁玕的《资政新篇》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，但当时天国政权已风雨飘摇。容闳发现太平天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理想国，他认为太平军素质低下，领导人贪图享乐，这些人不能推翻清王朝，更不能实现他的教育理念。他大失所望，落魄离开。1863年秋，容闳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。很快，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闳为出洋委员，赴美国购买机器筹办机器制造厂。往返历时将近两年，容闳采买的机器安全抵达上海，充实了曾国藩规划、李鸿章负责的江南制造局。曾国藩大悦，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，领高薪，命他协助管理江南制造局。

首率寒门幼童出洋

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，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支持。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，果然获得首肯。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，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，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，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。

1872至1875年间，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。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，回国安排工作，现在看来简直是做梦也难得的美事，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洋鬼子的“野蛮番邦”，并且一去就是15年。容闳这个“招生办主任”，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，挨家挨户动员，想起哪个熟人家有适龄儿童，甭管多少年没联系了，直接登门游说。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之弟，大多出身寒微。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，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，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。他们充分释放天性，在体育方面出尽风头，全然不像“东亚病夫”的后代。若干年后，他们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，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，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，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，交通总长梁敦彦，外交家欧阳庚……还有多名加入海军，在甲午战争中殉国。

对洋务派绝望

容闳试图实业救国。当时清政府根本不知道银行为何物，容闳托人给光绪递上条陈，详加说明银行的资金来源、权责、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、钞币发行控制、财务清算，甚至连债券、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。这是一套完整、系统且可行的方案。“帝师”翁同龢专门召见了容闳，计划得到光绪批准，容闳立即着手操办起来。孰料洋务重臣盛宣怀也一直伺机办银行，他携重金赴京上下打点，抢来了这个既得名声又有大利可图的项目。容闳草根出身，又留洋多年，对官场潜规则基本一窍不通，他忿然总结：“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，亦不

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，尊自太后，贱及吏胥，自上至下，无一不以贿赂造成。”

从维新到革命

1898年，容闳已经是70岁的老人，但维新变法让他重燃豪情。他积极参加维新派各种学会活动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都对这位改良先驱很看重，尊称他为“纯公”、“纯老”（容闳号纯甫）。容闳把自己在北京东安门的寓所提供给了维新党领袖作会场，容闳家便成了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。变法开展三个月，遭到慈禧太后等保守派扼杀，清廷开始全面捕杀维新党人，容闳也上了通缉名单。他潜逃出京，经上海租界迁至香港。经此剧变，容闳的思想更加激进，他在新加坡与康有为重逢，商量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起义营救光绪帝。1900年9月，容闳化装成商人，冠假名泰西登上赴日本的轮船。几乎同时，策反李鸿章反清失败的孙逸仙也匆匆登上这艘轮船逃亡，他化名“中山樵”。容闳与孙中山这对香山老乡曾经于1896年在伦敦匆匆一晤，这一次同舟共济使他们得以彻夜畅谈。孙中山主张推翻清廷扫除封建尘土，这是容闳此前没有想过的。他一生为报国上下求索不得其门，如今恍然意识到腐朽的专制制度是根本障碍，容闳的思想发生本质改变。

容闳晚年流亡香港，住在皇后饭店，他在香港的房间又成为革命党人聚会场所，他也加入革命党阵营，帮助孙中山筹集起义军费，支持他武装革命。

1911年5月，83岁高龄的容闳在美国家中中风。当年10月，他接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，激动地趴在床上写了三封信给革命党老朋友们，祝贺革命成功。孙中山回信，恳请容闳回来共建民国，但容闳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还没来得及启程，就于1912年4月21日客死异乡。葬礼上，牧师讲了这样一段悼词：“假如他还没有老，他一定会亲自参加革命，他的与生俱来的、热爱效忠中国的光焰，绚丽燃烧，直到他生命的尽头。”

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